

「2013年醫學史 與醫學人文研究 與教學」學術研 討會紀要

皮國立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醫學史的研究，在兩岸乃至世界史學界的影響力，皆與日俱增，這是近幾年學界都認可的一項發展趨勢。除了可以透過會議的回顧，來探討、掌握這些資訊以外；在研究與教學結合的意義上，我們其實都忽略了醫學史教育的真實功用。杜聰明先生曾在《中西醫學史略》的序言中說：「余讀醫學史時，感覺醫學之發達，均由傳統連綿而生，又由於有偉大醫學者，以其發明與發見，促進一時代之劃期的進展，而且其高潔之人格，常能感化門生後學之治學精神不鮮。」可見醫學史的教研對醫療從業人員的重要性，除了專業知識的啟發外，更為了陶冶高尚之精神與人格。專業技術一旦脫離人文，剩下的僅是知識的堆砌。醫師、醫療從業人員乃至廣大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人員，其生產知識的背後，要服務的對象其實最終還是具有生命與意識的芸芸眾生，而非冷冰冰的數字與器械，這是醫學史可以發揮重要的人文教育功能之所在。

2013年10月31日，應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人文系主任甄橙教授與尹秀雲副教授來臺訪問的機會，中原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在中原大學內合辦了一場名為「醫學史與醫學人文研究與教學」的學術研討會。會議一開始先由該校的人文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等介紹該校「全人教育」的內涵。接著，「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現任召集人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副所長劉士永研究員，則針對〈中研院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之現況與展望〉進行主題演講，他介紹了該計畫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別令人關注的是有關食品安全、食品衛生的歷史。近代以來，吃的好、吃得營養，乃是健民強國的藥方，所以營養觀念傳入中國的歷史，無疑影響了人們的日常衛生觀念；而食品安全的問題，乃現今全球化現象所共同關注的問題，研究這些歷史，無疑與現實生活有著極強的連結。在心理衛生史的部分，也是未來計畫發展的重點，例如心理疾病如何從「心」轉向「腦」的病變等問題。該計畫今後將選擇有效的研究方向，以申請更好、延續性的計畫，也將持續與大學合辦演講、出版專書等，來擴大漢人社會的研究方向，例如擴大研究範圍至歐美華人集居城市、唐人街、澳門、香港等地的醫療史、殖民醫療史等，並持續定義疾病與健康觀念的轉變，如何從一種個人衛生管理轉變成國家與專業的控管。



與會學者合影（攝影／顏肇佑）

早上第一場有兩篇報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秀芬首先針對〈歐美中國醫療史研究之近況〉進行報告，該篇報告以歐美機構為主軸，介紹各地區的研究，其中顯示了歐美的醫療史研究非常重視機構與主持人的力量，經年累月，即可培植一批繼承的學者，當然也各有研究的路數與偏好。陳提醒研究者未來要重視：什麼是各地醫者的傳統，在全球醫療史中，各區醫學有甚麼跨越邊境的現象，而不是只重視傳統間的整合，未來醫史研究與研究各區的醫學，不應受限於既有學科之間的範疇，會比較有想像力。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蔣竹山則發表〈醫療的全球史初探〉，他從明清人蔘史的醫藥書、本草書與消費之間的關係，發覺到醫藥、本草知識和當地知識的結合，所以主張要跨區域、跨國家的研究。蔣認為，醫療涉入全球史的思維，和文化史是有交集的，可進行一種延續性的探討。而全球史視野最重要的出發點，在於從單一民族國家的視野，轉向跨國各區域間醫藥知識和消費、商品的結合；此外，各國藥物流通和疾病、環境問題的全球化現象，也值得注意，所有民族國家的轉變，都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全球的網路體系中，過去歷史研究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也被打破了。需要補充的是，全球醫療史反而不必然否認地方的醫學史，也更強調民族國家跨邊界的幫忙。正如 Harold Cook 在〈全球醫學史會是甚麼樣子〉一文中指出，通過貿易、商品、殖民、傳教、

技術轉移等，醫療與疾病的知識被傳播到各地，過去只強調西方的影響，現在則強調一種西方文化到各地後的轉型與適應，在地的習慣如何反過來影響殖民政策，而成就了一段新的歷史，此即全球史觀。

下午第一場由北京大學教授甄橙報告〈中國大陸醫學史概況及北醫醫史學科〉，她用豐富的資料說明了近代中國一些研究醫史的人物和近代各個醫史學會成立之梗概，也介紹了一些過去與現存的醫史期刊。最有意思的是 1949 年之後的發展，因為大陸官方刻意保護中醫，使得醫學史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科。而於後來的發展內，中醫史和世界醫學史也都在「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佔有一席之地，這對培養醫學史研究人才是正向的發展。如果對比臺灣的狀況來看，臺灣的醫療史乃致於環境史等較新的學問，儘管西方的發展已有一定的基礎與熱度，但要在歷史系成為一門課程，持續地培養研究生，則並不容易。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副教授史慶璞，則針對〈醫學與人權〉進行報告，他指出：21 世紀醫學多元化及多樣化之發展，已將傳統醫療行為及程序導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空前境界。在傳統觀念中，醫學、醫療系統分進合擊以推動醫術發展之模式已緩不濟急，醫師、病友地位懸殊的狀況亦不合時宜，無法滿足現代醫療行為之要求。未來醫學科技之創新與醫療行為之變革，更使得醫療機構積極思考與政府及醫學研究和學術單位結合之可行性，將醫療法

規、權利義務等制訂完善。如此，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行為時不逾分際，人民接受醫療照護之權益方得確保。中國醫藥大學的林伯欣助理教授發表〈築夢與踏實——淺談古典中醫的經史觀〉一文，探討醫經醫史文獻之用。他認為，中醫沒有現代儀器，一位中醫必須了解古典醫學知識的資訊。在尊古的意味之外，醫經的內容隱含了一位中醫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確保自己能在天地間安身立命的技術與指引。林以其為中醫的身份與臨床經驗，指出了中醫學本身就是一個生命，所有的理念與方法都能隨主體（人）與客體（天、地）間的各種互動靈活變化，隨時代的流變不斷自生更迭。或許，未來應該重新審視中醫學教育、研究與臨床的發展方向；當今這些重要的議題，似乎已隨著時代的進步偏離中醫經典與核心越來越遠，在倡導醫學教育改革與現代化的同時，無形中也將不見容於科學邏輯的珍貴思維與古典文獻排拒出去。現代中醫教育的設計逐漸朝西醫的制度移動，標準化、規範化與制度化的模組設計雖然有其特色，但同時也逐漸喪失中醫學原有的傳統特色和優勢，令人憂心。

下午第二場，首先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金仕起〈閱讀古典醫學文本的兩個問題〉，以古典醫學文本為例，從閱讀者的角度出發，就資料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兩類斷裂性提出初步的觀察。古典醫學的文本並不是紙本，金希望藉由這個研究說明，這兩類斷裂不但俯拾即是，而且在古典醫學文本

被再製與傳寫之時，每位個別的本生產者、纂輯者，同時也是歷史的主體，在面對、認識、挪用、再製，或創造文本時，往往根據自身所在時代、地域、文化等不同的主客條件，去改動原本文字，賦與新的意義。例如醫學文本的「癰」、「疔」，在《內經》所記載的以男性前陰腫墜為主症的疾病中，必有屬於今之所謂絲蟲病所致的鞘膜積液或陰囊象皮腫。但在當時法制史內的「癰」字，則是指衰老病弱的人、手足不便、駝背、廢疾、身材矮小者，與醫學文本所指陳的顯然有所不同。金認為，透過這樣的論述，一方面可以嘗試呈現古典醫學文獻內之眾聲喧嘩、多元不一的面貌；另一方面，文本固然提供了客觀的共通基礎，但古典醫學的變遷及歷史影響，並非隨文本形成就先天而具；相反的，它來自不斷的解讀、詮釋與挪用。故文本所記載不一定是原來的「事實」，可能有想像與虛構成份在內，不能完全看成事實。我們努力疏通經義，但別忘了其中記載的問題，文本要更仔細的考證，才能想、讀出不同的東西。這篇文章其實可以和林伯欣的文章對比，林在提問時回應：用臨床的角度，古典文獻記載的問題，還是可以被實證的，面臨生命問題時，不論文本原始面貌為何，在改動的過程中，每位更動的作者仍是以解決問題做為出發點，所以還是有當時代的經驗與價值在內。金與林的兩篇文章對話，顯示了史家和醫家在思考上的激盪。林指出，史家的這種研究對醫家

也是有貢獻的，因為它提醒了醫生，閱讀文獻時也必須注意生產知識者的歷史脈絡，不能把醫書上的知識視為理所當然，還要進行更多的思考與檢驗，在臨床實證上才會有新的價值。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許宏彬則發表〈醫學的「時間」：戰後初期臺灣的醫學教育與缺席的醫學史〉，他以被遺忘的杜聰明做為出發點，指出醫學史很重要，但是在戰後臺灣的社會，一開始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但是，杜聰明其實就寫有《中西醫學史略》，只是在臺灣常為人所遺忘。國立臺灣大學在 1950 年代的醫預科，大一、大二都沒有醫學史，課程方面僅有中國近代史、俄帝侵華史等，當時的時空背景，歷史教育是一種國族主義的愛國教育，不可能容納專科醫學史。爾後，臺大醫學院的《青杏》內，顯示一種醫學進步觀，當時臺灣的醫學留學生嚮往美國的醫學實作、實驗課程與實習制度，並開始與日治時期的醫學切割，大批的醫學生前往美國學習課程，但這一代的醫學生卻處在嚴重的失落氛圍，身處美國文化內，不可能書寫傳統中醫史，臺灣的日治西醫傳統，又正被遺忘。此時，面對自身從何而來、該往何處去的處境充滿疑惑，臺灣醫學的歷史傳統還有待建立，故他們對醫學史的態度只有被迫遺忘，醫學史一科也在醫學教育中缺席了。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最後發表〈民國時期西方醫學史的引介與內涵〉，該文探討西

方醫學史在民國初年的介紹、教學和研究。他指出：民國時期傳統史家的力量不見進入專史研究之內，許多治醫學史者，多為醫者出身，當時西醫學史也偏重介紹和教學，研究較少，這當然與資料取得之難易程度有關。民國初年所引介之西醫學史，有史學與人文方面的目的、也有進化的意義在其中；在中西醫論爭的年代中，西醫史代表一種對現代化醫學之嚮往。中醫自是不在話下，令人驚訝的是，當時的西醫，不僅研究西洋醫學史，同時更關注中國醫學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絕對的區別中醫史和西醫史，有時會忽略很多知識互動的實情。況且民初的西方醫學史本來就不完全是「西醫」的歷史，也加入了許多在中國的西醫歷史，和西方對中國醫藥之研究，換句話說，中西醫學的互動與糾纏，顯示民初新學科在既有之傳統視域中，一方面想突破創新，另一方面又必須不斷與傳統對話的現實意義。許宏彬和皮國立的論文都顯示了，醫者其實也是歷史洪流中的一份子，他們關切的事物與努

力的軌跡，往往可以在醫學史的研究中找到證據。

最後的綜合討論，劉士永指出，醫學史從來沒有脫離現實。經過一天的討論，今後我們或許可以追問：日本醫學史在哪裡？他們怎麼看待中國醫學史？又，在西洋醫學史內，西方如何看待各國的醫學發展史，這些研究選題都是值得開發的。他並指出，未來臺灣的醫學史研究發展是樂觀的，例如國立陽明大學就可能成立醫學史的研究中心，可望與醫學院的課程結合。而參與會議的大陸學生則指出，其實在大學通識課中也有醫學史的建置，如果能跟專業醫學院的醫史教學進行對話，或許能激盪出更多教學的火花。總之，與會人員皆認為這是一次有意義的會議，我們研究一種專史、也要能知道這個專史的近代「史學史」與未來的發展；如此，研究者自身才能知道其所處的時代和位置，思考更有意義的研究論題。最後，該研討會也希望集結文章，出版一本論文集，能提供未來研究醫療史的初學者，一些方法與研究經驗上的指引。